

先秦君子在世俗生活中  
具有相当强的理性精神，  
他们不但

时时思考着如何生活，  
而且还处处

思考着如何做人，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有修养有道德的人，

有崇高的思想境界，

并把它付诸实践的人，

有公正无私的胸怀

并让人敬仰的人……

# 先秦君子风范

王钟陵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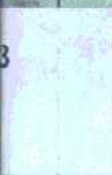
陈洪

副主编

赵敏俐

著

东方出版社





先秦君子风范

——中华民族文化人格的历史探源

王钟陵 主编  
陈洪 副主编  
赵敏俐 著

東方出版社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  
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小雅·南山有台》

## 第一章 鹤鸣九皋， 声闻于野

——建构于贵族时代的人格理想

大约在公元前 1122 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改朝换代、重写历史的重要战争——殷周牧野战争。那一年，周武王率领戎车 300 乘，虎贲 3000 人，甲士 45000 人，和诸侯兵车 4000 会于孟津，誓师伐纣，陈师牧野，与商纣王的 17 万（一说 70 万）大军展开了生死决战。这本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从人数兵力上讲纣王都占绝对的优势。可是，优势的兵力并不能改变纣王失败的命运，因为作恶多端的纣王早已得罪了天下，处于失道寡助的地位。据记载，战争开始之前，周武王在阵前首先宣布了纣王的十大罪状，周军个个士气高昂。他们为能参加伐纣的战争而欢乐异常，前歌后舞，奋勇呐喊，冲锋向前。而纣王的十七万大军大多是强迫征来的奴隶，本无心作战。他们在阵前起义，反身击纣。商纣王败走鹿台，自感无望，焚身而死。周武王挥军直追，以黄钺斩下纣头，悬挂在太白旗上示众。人们高呼“上天降喜”，并践踏纣尸以泄其愤。殷商王朝自此灭亡。<sup>①</sup>

关于商王朝灭亡的原因，古代就有众口一词的说法，那就是由于商纣王的残暴无道；而周之所以兴盛

---

① 武王灭商的年代，史学界有几种说法，有的定为前 1122 年（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有的定为前 1066 年（范文澜：《中国通史》），有的定为 1027 年（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还有的约定为前 11 世纪（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此处姑且从第一种说法。

的原因，自然也早就有公论，那就是自周文王开始就推行仁政的结果。当然在今天看来，象殷周代兴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重大的变革，并不是仅由于如此简单的原因所致，当代历史学家们已经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各个方面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古人、特别是先秦儒家在对殷周社会变革进行理论解释时，都突出强调纣王的残暴和文王的仁政，强调周代的礼乐文明。在他们看来，周代的礼乐制度不但是后世社会的典范，周代的圣君贤臣也堪称后世人生的楷模。

生当春秋后期的孔子，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就曾经说过这样充满仰慕之情的话：“周代的礼仪制度在吸收夏商经验的基础上创建，有多么美好的文采呀！”（《论语·八佾》）他甚至在梦中也不只一次地神往那个让他仰慕不已的圣贤周公，以致年老时还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衰老的多么厉害呀！好久都没有再梦见周公了！”（《论语·述而》）也许，孔子毕竟尚属于周代末世的贵族，对于周代盛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生当鲁国，对于鲁国的祖先周公别有一种不可割舍的情怀。但后世对周代盛世追怀的决不仅是孔子一个，对文王、周公景仰者也决非孔子一人。从现有的历史材料看，周人自从建国之后，不但创设了一种远较商代社会要先进得多的文化制度，也的确培养起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时代新人。他们大都生长在当时的贵族之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长大后活

跃于政治舞台。在世俗生活中，他们有文温而雅的风度，在立身行事中，他们有自觉的道德追求；在政治舞台上，他们是名声远扬的风云人物；在戎马生涯中，他们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在中国的第一部诗集《诗经》当中，有对他们深情的赞美和永远的追念；在《左传》、《国语》等记载这一段历史的史书中，有对他们人格业绩的各种记述；在战国秦汉间人的著作如《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淮南子》、《史记》、《新序》、《说苑》、《韩诗外传》中，更记录着数不清的关于他们的传说故事：如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制礼作乐，辅政安民的杰出政治家周公旦；一匡天下，九合诸侯，辅齐桓公以成霸业的管仲；让都鄙有章，上下有服，于小邦危难中振兴郑国的子产；主文而谲谏，守节又知礼，文雅多智的齐相晏婴；汲汲于克己复礼，高倡仁者爱人，把一生都献给了培养人材的教育与整理文化典籍事业的孔子等，都足以让后世代代敬仰。其他如召公治政、太伯让贤、孙叔敖谏楚王、申包胥哭秦庭、晋祁奚荐贤、齐太史直书、子罕以不贪为宝、石奢以舍生取义等，每一个小故事中莫不活着一个鲜明生动的人物。他们虽然属于那个特殊的时代，其思想行为打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但是他们在人生价值上的高尚追求却足以为后世垂法，并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鹤鸣九皋，声闻于野”，他们的时代虽然已经距离我们那么遥远，但是他们的风范却至今永存。他们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批道德楷模。

今天，当我们重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民族文化道德素质，为此而再一次回顾历史的时候才霍然发现，原来，我们一直在探寻的民族文化道德理想，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它的历史原型，对他们的人生风采进行历史的追怀，乃是我们探讨中华民族文化人格如何得以形成的起始，也是重建高尚的社会主义民族道德精神的必要准备。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虽然距离我们已经那么久远，但是拂去蒙在他们身上的尘埃，却看见他们仍然是那么神采奕奕，正微笑着向我们步步走来。那么，我们何不迎上前去，与之进行一次心灵的交流……

## 一 君子喻于义

我们所敬仰的这一批古代先贤，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春秋时代，习惯上被人们称之为“君子”。何谓“君子”？从西周春秋的一般意义上讲，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显然，这是一个有着明显的阶级意义的称谓。要被人称之为“君子”，从经济和政治上首先就要有一定的地位，要有“君”的尊贵。许慎《说文解字》说：“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尹为古代部落酋长之称，他本是一个部落的最高统治者，有着管理本部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权力，可以向他的臣民们发号施令，所以在甲骨文中，尹和君就具有同样的意义，在殷商时代也是一个官名。在周代社会，

“君”起码也要指大夫以上，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仪礼·丧服》说：“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故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君子”一词，当它成为统治者和贵族男子通称的时候，也首先有与“小人”和“野人”相对举的意义。例如在《诗经·小雅·采薇》这首诗中，当诗人描写将帅出征驾驶着战车，士兵们则掩蔽在车下时就这样写道：“驾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驾起四匹大公马，四匹公马高又壮。君子依在战车上，小人隐蔽战车旁）。《孟子·滕文公上》则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因此，当我们看《诗经》中那些歌颂君子的诗篇时，首先就要想到它所具有的贵族等级意义。在这些“君子”中，周王显然是最杰出的一个。所以在《诗经·大雅·假（嘉）乐》这首诗中就这样歌颂周王：“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我们赞美君子成王，他的善德显耀传扬。安抚百姓，任用贤人，他的福祿从天而降）。”

在先秦人的文化观念里，“君子”不但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还要有高尚的品德。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是所有的周代贵族都可以称得上是“君子”，只有在贵族中那些才德出众和有特异节操之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君子。《周易·乾卦》说：“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整天有忧愁，夜里也要提防，但最终没有什么不好）。”《文言》对此解释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



以居业也。知至至之（知道如何达到目的并努力去达到），可与几也；知忠忠之（知道什么是忠并忠心不改），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由此可见，在周代社会文化观念中，“君子”虽然是一个具有阶级地位的称谓，但同时人们对“君子”也有着严格的才德要求，“进德修业”是其最基本的条件。所以孔子在评价子产时就说他有四种行为合于君子之道：对自己的态度庄严恭敬，对待君上认真负责，对人民施以惠爱之心，对百姓进行合理使用（《论语·公冶长》：“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还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由以上记载，我们会了解当时人心中的“君子”观念。

正因为“君子”一词含有道德评价的意义，所以在西周春秋时期中，人们往往把那些虽非贵族出身但在言行举止中有可称道之美德者也称为君子。据《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有一天，晋景公视察军中府库，看见楚国俘虏钟仪关押在里面，就问：

“那个戴着楚冠被关的人是谁？”

掌管府库的人回答说：

“是郑国所献的楚国俘虏。”

晋景公下令去掉刑具，召见并询问他的出身。钟仪跪拜致谢，回答说是乐官。晋景公又问：

“乐官出身，那你能演奏乐器吗？”

钟仪说：

“乐官是我家世代的职业，我怎么能不会呢？”

晋景公让人给他一把琴，他就弹奏了一段楚国音乐。晋景公又问：

“你们的君王怎么样？”

钟仪说：

“请原谅，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晋景公再三地问，钟仪只好说：

“我只知道他当太子的时候，老师关心教导他。他每天早晨都要请教贤相（令尹）子重，每天晚上都去侍奉贤臣司马子反。别的就是知道了。”

晋景公把这事告诉了范文子。范文子说：

“楚囚钟仪真是一个君子啊！说话先提自己的祖先职业，这是不忘本；弹琴演奏楚国的音乐，这是念旧；称赞太子，以小示大，是至诚无私；颂扬二卿，是尊敬晋君。不忘本，是仁；念旧，是信；无私，是忠；尊君，是敏达。做事情以仁相接，以信来守，以忠来完成，以敏达来行动，再大的事，都能做好。君王何不放他回去？让他使晋楚两国结好呢？”

晋景公觉得范文子的话很有道理，就把钟仪放了，并用很高的礼节款待他，让他回去做结两国之好的使者。

钟仪本是个俘虏，其家世也不过是个乐官，但因为他的一段对话得体，从中可以看出他内在的“仁”、

“信”、“忠”、“敏”等高尚品质，范文子便称他为“君子”，不但把他放了，而且还给他以很高礼遇，让他作为和好两国关系的使者。从这件事可见，春秋时人对君子的解释已经重视它所包蕴的个人品质含义，它是做人的理想，也是从道德品行才能智慧等方面对一个人的极高赞誉。一个人要达到“君子”的境界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他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广博的文化知识，文雅得体的举止，宽厚待人的胸怀，忠心为国的态度或者其他某一方面优秀的品质；还要不断地进德修业，思善改过。《国语·楚语》说：“君子临政思义，饮食思礼，同宴思乐，在乐思善（君子在处理政事的时候要考虑到什么是正义，在吃饭的时候要想到合适的礼节，在参加宴会的时候要想到美好的音乐，在欣赏音乐时要向善人善事学习）。”孔子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就是说，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相得益彰，这才是个君子。反之，就是那些贵族，如果道德不称，也不能算作君子。

有一天，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冉有：

“一个人，只要他的内在本质好就可以了，为什么说一定要经过学习才能成为君子呢？”

冉有回答说：

“臣听说，虽有美玉，不经过刻缕琢磨就不能成器，虽有美质，不经过学习就不能成为君子。子路，

本是卞地的一个农夫野人，子贡，本是卫国的一个商人。他们都求学于孔子，才成为天下名士。诸侯听说，都尊敬他们，就是因为学习的缘故。从前吴楚燕代四国想联合攻打秦国，姚贾本是一个守门小吏的儿子，秦王派他出使四国，靠他的游说，四国罢兵。回国之后，秦王非常高兴，就立他为上卿。百里奚在齐国以乞讨为生，流浪到秦国，没有进身之门，就用五张羊皮的价格把自己卖了。后来见到秦穆公，立为相国，帮助秦君成就了霸业。姜太公年轻时被人招赘为婿，老了又被赶走，在朝歌宰牛，在棘津当雇工，在磻溪钓鱼，周文王举用他，后来被封于齐国。管仲箭射齐桓公，桓公不计前恶，立他为相，振兴齐国，九次会合诸侯，平定天下。这四个人，都曾经有过卑贱穷辱的经历，然而他们的名声都显扬于后世，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当初学习的结果吗？由此可见，一个人必须学习，然后才能成为君子。《诗经》上说：‘日日有所成就，月月有所进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于是哀公笑着说：

“我虽然不成才，但是愿意向先生学习，也要做个君子。”（见《韩诗外传》）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君子”一词在当时所包含的双重意义：从最初一般的意义上讲，它是对一个有一定身份地位的贵族的通称；从引申意义上讲，它又专指那些有着高尚道德品质的人而言。在西周春秋时代，贵族是社会的统治者，也是统治那个社会的道德伦理

的主要文化载体，正因为如此，即便是专从道德品质方面而言，先秦“君子”的主体也自然是指那些贵族。一个没有较高政治地位的人而被人称赞为“君子”，那实在是对他的道德人品的极高赞誉。一个人必须经过学习，必须有非凡的品质才干和功业成就等才能成为君子，这是西周春秋时代人们对“君子”的最高理解，也是他们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最高追求。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早在西周春秋时代的人们，就已经自觉地开始了那种对于“君子”人生的积极肯定和不懈追求了呢？

## 二 明主贵有德

要回答这一问题，也许从一般的社会变革角度很难说清，我们还应该深一步追索到时人对于社会变革的理解和对自我本质的认识。对于西周人来说，殷商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建立这一变革实在是太大了。它不但改变了历史，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当周人怀着兴高彩烈的心情营造自己新的王国的时候，同时也带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恐惧。他们不能不思考殷亡周兴的原因，不能不担心自己将来的前途命运。“敬德保民”之所以会成为周初确立的统治思想，正表明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严肃思考。他们认为，殷商王朝之所以灭亡，就因为对百姓的残暴和自身道德的败坏；而周之所以兴，也是因为他们对人民的仁爱和自身道

德感化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在周人的历史文献中，关于殷人如何缺德败国和他们如何以德兴国的记载特别突出。《诗经·大雅·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文王有声》、《生民》、《公刘》等诗，集中对周人的几代开国君王的道德功业进行了热情的讴歌。请看他们是如何记述自己民族的发迹史吧：

据说，周人的祖先名叫后稷，后稷的母亲姜嫄本是帝元妃，因为在田野中踩了上帝的大拇指印而生了他。后稷生下来就会种庄稼，造福于天下，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以被尧举为农师，在虞夏之际仍为农官，并因为有功被封在名叫邰的地方。以后夏代政衰，不重视农业，后稷的儿子流落到戎狄之间。过了几代，到了公刘时，又重修后稷之业，迁到豳地，发展农业，广有蓄积，人民生活幸福，远近的百姓都归附他。

又过了几代是古公亶父，仍继承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百姓都拥戴他。因为豳地接近戎狄，常受侵扰。古公给他们一些财物，他们用完又来抢夺，想要霸占土地和人民。百姓都非常愤怒，要和戎狄作战。古公说：“百姓拥立君主，就是让他造福人民。现在戎狄发动攻战，为的就是土地和人民。百姓们归我和归于戎狄，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因为我的缘故让百姓们去打仗，死伤他们的父子兄弟，我是于心不忍的。”于是率领自己的亲属离开了豳地，渡漆水、沮水，越梁山，来到了岐山脚下。豳人感念他的恩德，举国上下

扶老携幼，全都跟着古公来到岐下。其他邻国的百姓听说古公仁义，也都来归附。于是古公改变戎狄风俗，营筑宫室城郭，安置教化百姓，建立官府制度，人民安居乐业，歌颂他的功德。

古公有长子名太伯，次子名虞仲，三子名季历。三人中以季历最贤，季历娶的妻子也最贤，生个儿子名昌，有盛德祥瑞之兆。古公说：“我的后代要强盛起来，大概就从昌开始吧！”长子太伯、次子虞仲知道古公将要传位季历和昌，二人就跑到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土人同处，把君位让给季历。季历修古公之道，笃行仁义，诸侯都归顺他。

季历去世，昌继位，就是西伯文王。他遵循后稷、公刘之业，执行古公、季历之法，笃行仁义，尊敬老人，爱护幼小，礼贤下士，为接待贤者到中午都顾不上吃饭，因此贤者都来归附他。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善养老，从孤竹国来了；太颠、闾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贤才之人也都归附他来了。这时纣王残暴，而西伯行善，所以诸侯有了争端都到西伯这里来评理。当时虞、芮两国之君为地界而争吵不休，也找西伯来评判。他们一进入周国，发现这里的农夫在地界上个个相让，人人都能尊老爱幼。虞、芮两国之人还未见到西伯就感到非常惭愧了。他们说：“我们所争夺的，都是周人感到可耻的事，我们找西伯评理不是自取其辱吗？”于是互相尊让，不再争执就回去了。诸侯知道此事，都说：“西伯真是受命之君啊！”因为西伯有仁

德，当时天下的 2/3 都归附了他。但西伯仍在修德，臣服商朝。

西伯文王去世后，武王即位，继承和发扬文王的事业，奉太公望为老师，命周公旦为辅佐，召公、毕公等人为左右，一时人才毕集。这时候纣王的残暴日甚一日，杀王子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着国家乐器也跑到了周。武王觉得时机已到，可以得到上帝的保护，于是遍告诸侯伐纣，在牧野誓师，宣布纣王的罪状，奉天之命施行讨伐，建立了新的王国。

难道周人兴邦所依靠的仅仅就是文武先王的仁德吗？其实也不是，它与商之代夏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武力争夺，这一点在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当周人在岐山之下有了一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后，就已经开始了东征西讨，伐犬戎，伐须密，败耆国，伐崇侯虎……一仗接着一仗。和纣王战于牧野，据说也是血流漂杵，战争异常惨烈（见《尚书·武成》）。可是，周人在歌颂他们民族的发祥史时，却和商人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商人在自己的民族史诗《长发》、《玄鸟》中不但不隐讳暴力，反而充满了对它的歌颂，他们把自己的种族视为天帝的嫡系子孙，把对异族的征伐说成是奉天的命令，把武力的征服看成是最好的英雄业绩。这说明，在商代的文化观念中，天帝神明仍然是人间的统治者，人世的一切都由天来左右，人只是天的奴隶，只能按天的旨意行事而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力。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的自己在改造社会



方面的能力。而周人在自己的史诗中却很少言及这种武力征伐（《诗经》中只有《大雅·大明》和《皇矣》两诗里略有提及，那也表明他们是仁义之师，是在替天行道），也不再歌颂那些暴力乱神。和商人相比，他们的确更看重先王的道德。他们津津乐道地编述从后稷、公刘、古公、到文王、武王这些先祖们如何有高尚的品德、如何进德修业、以德兴国的故事。这说明，周人比殷人更多地摆脱了尊天事鬼的上古宗教巫术观念，也有了比殷人更为进步的世界观，更多地看到了人自身的伟大力量，看到了人类精神文明在推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

殷人以尊天事鬼立国，周人以德行礼教立国。一个重天，一个重人。从重天到重人的变革，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一次伟大觉醒。周人以自己那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向后人说明：社会的进步不只是物质创造水平的进步，更应该是人的精神文明素质的提高。

正因为周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才把对世界和对社会的思考集中到了人自身，他们把道德看成是立国的根本，把道德的完善看成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第一要义。他们把文王视为最好的榜样，“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在《诗经·大雅·文王》、《大明》和《思齐》等西周早期文献中，就已经初步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大雅·文王》：“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